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芃
主编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 清遗老的精神世界

[美]周明之 著

Cultural Crisis in Modern China:
Qing Loyalists and Their World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芃
主编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 清遗老的精神世界

[美]周明之 著

Cultural Crisis in Modern China:
Qing Loyalists and Their World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美国)周明之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607-3691-4

I. 近...

II. 周...

III. 历史人物—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825 号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20×1010 毫米(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43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新史学沙龙》编委会

主编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芑

顾问(以姓氏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Carlo Ginzberg 卡罗·金兹伯格(意大利)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美国)

Juergen Kocka 于尔根·科卡(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于 沛 朱政惠 刘家何 何 平

何兆武 李幼蒸 周春生 赵轶峰 曹特金

总 序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八十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第一位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

的，是必须要有一份对中国史学存续承继的厚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应是人们进行相关思考的起码的心理基础或共识。

我们发现，能同时体现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说没有，而是太过其少。对于巨变中的史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新史学沙龙”出焉。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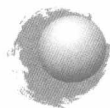
2008年4月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革命的冲击	(6)
第二章 新思想的先锋	(10)
梁济,1859~1918	(10)
王国维,1877~1927	(11)
罗振玉,1866~1940	(21)
郑孝胥,1860~1938	(31)
第三章 辛亥革命的催化作用	(39)
潜伏的忠和保守性格	(39)
忠的再度肯定	(42)
今是昨非:对过去的自我的否定	(48)
文化和学术的重建	(52)
第四章 遗老的生活	(55)
租界,辫子,儿女婚姻	(55)
郑孝胥的经营	(59)
王国维的选择	(61)
罗振玉的海外生涯	(80)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

第五章 遗老的复辟活动	(85)
张勋复辟	(85)
复辟的时代错误性	(86)
反对多而主张少	(94)
动机的政治观	(97)
外国势力和复辟运动	(101)
第六章 保护和整顿宫廷	(105)
溥仪的心情	(105)
留学问题	(109)
优待条件	(112)
任用新血	(116)
移宫颐和园	(122)
裁减人员	(124)
私有财产	(128)
优待条件的修订	(132)
第七章 遗老与日本	(135)
护驾出宫	(135)
日本使馆	(138)
天津日本租界	(144)
天津七年	(148)
第八章 文化学术的重建	(156)
经世致用的怀抱	(156)
罗振玉的经世事业	(160)
王国维的经世之学	(165)
远离现实的消遣学术	(172)
第九章 遗老的内讧和分歧	(178)
王国维和南书房行走	(178)
清华教职	(180)



王、罗的决裂	(184)
王国维的自沉	(191)
第十章 遗老的最后努力:满洲国	(198)
清室内部的动力	(198)
满洲国执政	(205)
遗老的心情	(213)
满洲国中的遗老	(215)
第十一章 王道理想国	(224)
王道思想的缘起	(224)
皇帝为政治之本位	(225)
孔子为文化之本位	(230)
王道的理想世界	(232)
满洲国的王道社会	(234)
日本与王道	(242)
第十二章 复辟的结束	(251)
郑孝胥的最后见解	(251)
溥仪的下场	(257)
参考书目	(261)

绪 言

以朝代为对象的忠贞观，到了 20 世纪的上半叶，对少数中国人仍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今天的观点看，尤其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个眼光敏锐、思想开明的精英分子，仍然以毫无保留的态度，信从实践这种忠的思想。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立即放弃了为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从此与民国和西方文化为敌，而终至于依附日本，以求达成恢复清朝的目的。这几个忠于清朝的知识分子，便是我在本书中所要研究的对象。清朝的王公后裔，怀有种族情感的满蒙人士，以在宫中任职为生的人，以及以忠于清朝图利的人，都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清亡之后，对朝代的忠的观念只在很少一群人的思想意识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我的目的，便是要了解这几个人的精神世界。

这一群遗老之中，以王国维、罗振玉和郑孝胥牵涉最广，留下的资料最多，所以我对他们的讨论也最深入。同时，我也在全书多处论及沈曾植、劳乃宣、陈宝琛等人的看法。梁济对清朝的忠，有其独特的一面，不能将其与其他遗老视为同一类型。我对他的心情，有详细的分析，不但是为了要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而且也是要以他为实例，说明忠的另一种表现的方式。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在写清朝遗老的复辟史，也无意以这几个人物的生平事略为全书的重点。我是在大的时间顺序之内，以主题为中心，讨论他们思想的发展和心情的变化。

我对遗老的兴趣，最初是由阅读王国维引起的。我对王的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便很自然地开始追问他忠于亡清和自杀的动机。他是辛亥以前思想最开明、最热衷于西方文化的人，所以他辛亥以后思想信念的转变颇费我们的思索。英国史家 Herbert Butterfield 说，治史者的倾向是把过去的史实纳入“现在”的框架，建立与现在相似的特征。可是与我们不相似 (unlikeness) 的现象反而更能使我们的想象力丰富，并增加我们在知识上的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

愉悦。治史者不应强调和夸张两个时代的相似，而是要担任过去与现在的媒介，阐释历史事件中异于今天的现象。我们陌生的现象，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现象。^①

我要把梁济分开讨论。对其他的几个遗老，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遗老对“革命”和辛亥革命抱什么态度？他们怎样交待清朝的败亡？他们如何进行复辟？在他们的计划中，复辟后的中国将是怎样的形势？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中，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现代化，而现代化便必然要接受某些西方文化的成分。所以遗老在这一方面可说是完全孤立的。他们反对西方文化，主张振兴儒学；在辩论这个主张时，他们有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他们对中国今后的文化和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及生存，提出了什么解决的方案？为了复辟，他们不惜与列强联盟，郑孝胥和罗振玉更在“满洲国”中任官。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民族主义的高潮期，遗老有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冲击？他们对民族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对列强在华的侵略持什么立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国外患，他们对于联日有没有顾虑？他们帮助日本建立“满洲国”，对中国的远景怀什么想法？我在本书中，将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我的这些中心论题，都环绕着“忠”和“现代化”这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怎样判断清遗老以朝代为终极对象，在任何情况下义无反顾的忠呢？我们在评论忠臣、遗民时，往往无法超脱中国固有道德观念的限制，对他们只有一般性的感叹。可是感叹无助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看胡平生给清遗老所下的结论：

[清朝]复辟的本质在于恢复旧制，是消极而退守的……复辟派屡遭挫败，未能有成，本不足为奇。不过部分复辟分子虽然冥顽不灵，但却始终如一，至死不渝，其心可悲，其情可悯，自不宜过分苛责，以失公道。^②

如果我们走出这种限制，而以没有预设的历史眼光来试一分析，我们便看到各朝遗老违反理智、充满意气 and 道德傲慢的一面。刘子健(James T. C. Liu)、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Jennifer W. Jay 等人的研究，使我们对宋代忠臣和遗老的这种性格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的书是对清遗老这种思

①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65, pp. 9-18.

②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 1985 年版，第 503 页。



想和心情的一个全面性的解释。我讨论的深入和详细以及涵盖层面的广阔,都超过上述三人;在重点和方向上,也与他们有所不同。

第二,在现代化方面,清遗老要以周公、孔子的理想来挽救中国现代的危机。从他们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态度的单一性和排他性。这是他们绝对的忠的必然结果。辛亥的民主共和革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遗老既然反对共和,所以也当然反对产生共和的西方文化以及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政治的保守与文化的保守在他们的思想中合流了。可是遗老不能指出,周孔之道是否曾在中国的哪一朝一代实现过。因为这个理想世界,仅是在他们想象之中存在的乌有之乡。然而他们有了这种心情,所以仍然一味坚持,要将周孔的理想具体并且一成不变地在两千年以后的中国实行。在他们的思想过程中,他们把其他一切的可能性都排斥了。所以在他们要重建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外来的新成分。遗老的这种心情,是我在书中所大力分析的另一个重点。

研究清季遗老,在方法上需要有一份自觉。治史者常以“现今”为出发点,把研究的对象分成进步之友和进步之敌(friends and enemies of progress),以为“历史女神克莱欧是站在辉格进步党一边的”(Clio herself is on the side of the whigs)^①。这一倾向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也十分明显。中国近代史上最流行的论题之一,是维新派(进步之友)和保守派(进步之敌)两大阵营的对垒。我全书的主题之一,是检讨清遗老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的反应,在讨论他们的过程中,有很多对他们的批评。讨论遗老时,要完全脱离西化和传统的敌对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不是要避免这种取径,而是要从多方面照顾这个问题,避免将遗老的思想简单化。我将对遗老尽力做到公正,然而我不敢说我是中立而无偏依的。所谓“客观史学”实是漫无目标的史学;它只是没有方向、没有结论的史实的堆积。^② 我的目的

① Butterfield, pp. 1-8. 研究美国南北战争的 David Herbert Donald 甚至说,治史者往往跟随胜利军队的营帐而行,见 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Nature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Columbus, Ohio: Charles E. Merrill Books, Inc., 1965, pp. 47-48.

② 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Edited,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Fritz Ster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 316. Beard 说, "What is called 'objective history' is simply history without an object". "客观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挑战和所遭遇的困难,见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e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有十分详尽的分析。另一个反对“客观史学”的有影响的人,是 Carl 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7.2 (January, 1932), pp. 221-236.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

是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之下，把遗老的思想活动分析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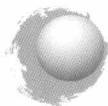
与这一点紧密相关的是我们对遗老的判断的问题。除了梁济以外，遗老的言行是辛亥以后中国继续分裂、不能统一的许多因素之一。与日本结盟以及依附满洲国的遗老，更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我们对他们应持什么态度呢？这里涉及史学中道德判断的问题。褒贬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最突出的特色。在近世的西方史学界，它却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在西方史学中，赞成和反对在史学中作道德判断的，提出了许多理论的根据。我这里只以两个有影响的英国史家的立场，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多元性。Herbert Butterfield(1901~1979)认为史学的目的，在了解过去，而不在颂扬和谴责前人。持这种史学观的治史者，在“腾空”自己的心情(self-emptying)之后，以“富有想象的同情心”(imaginative sympathy)去重建过去的真相。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对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有无休止的道德评判，可是史学者却应超越于各种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争论之外，对这一历史事件重建一层更真实的了解(deeper sense of truth)。所以道德判断与史学研究是不相干的，也是我们企图了解过去时的一重障碍。^①

另一方面，Isaiah Berlin(1909~1997)对于史学不应下道德判断的种种辩论，包括Butterfield的观点，极力批评。他说，历史所研究的，不是空间的物体，而是活动于社会之中、有目的、有动机的生命，所以史学的方法与精确科学的方法，绝然不同。治史者在研究人的活动时，必然要牵涉道德及心理的层次。纯粹叙述，不含道德判断，没有个性的客观史学是不存在的。^②

史学应不应作道德判断的辩论，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使我们产生一份自觉，而不轻易地作道德性的裁判。然而在实际情况之下，维持道德中立，又谈何容易？我们在做研究时，不可能不提问题，而我们所提的许多问题，不但含有普遍的道德观，而且往往也反映了我们个人的取舍。我们在研究明太祖廷杖、清初文字狱等问题时所提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多少会有一些道德的含义。可是我们也绝不应急于以褒贬为我们的主要任务。过多的道德裁判的确有碍我们了解过去。道德判断一旦成了我们的中心关

① Herbert Butterfield, "Moral Judgements in History," in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52, pp. 101-130. 前引 Butterfield 的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最后一章的篇名也是 "Moral Judgments in History", 强调略有不同, 读者也可参看。

②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pp. 145-166.



怀,它便必然掩盖了其他许多有意义的史学问题;Butterfield 提醒我们说,许多急于下道德判断的史学研究,常在完成之前便中道而废。^①这是因为作完道德判决之后,治史者的目的已达,其余的便没有兴趣深究了。

我所以提出史学中的道德判断问题,因为它是我在撰写全书的过程中,尤其是后半的章节时,始终没有停止思考的问题。我没有离开 Berlin 所说治史时道德和心理动机的层面。读者也必能看出,我的论断明白显示我与遗老的立场相左。不过,我写作全书最大的动机,是分析而不是谴责,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我的价值立场没有掩遮书中其他问题的重要性。

本书构想有了初步心得后,曾于 2004 年年尾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史学会议上作口头报告。历史系退休教授 Ernest P. Young 以遗老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疑问。他的质疑促使我在这一问题上作了进一步的阅读和思考。多年老友 Ronald S. Suleski 对我一再鼓励,并将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图书馆所藏有关郑孝胥王道的全部文字复印寄赠。另一友人叶帼雄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多次为我查对及复印资料。山东大学的好友苏位智教授向山东大学出版社推荐此书,并在济南多方照顾各细节。对于以上的四位友人和山东大学出版社,我要特别在这里表示由衷的谢意。最后,我谢谢我妻子给我的许多帮助。

^① Herbert Butterfield, "Moral Judgments in History," in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 p. 103.

第一章 革命的冲击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清室的溃败，是一个快速而有决定性的历史事件。武昌起义没有遇到持久的抵抗；1912年2月溥仪退位，也没有强烈的抗议。这一切都说明，革命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而且清室也已失去了向心力，在政府和民间，它都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

然而在这种气氛之下，却有极少数的人，以不妥协的态度，继续效忠清朝。他们在忠之外，没有其他的考虑。我们认为，以往对朝代的忠是常态。然而20世纪初年的价值观念和情况变了，清遗民的决定，被视为是异乎大多数人的行为，因此也更需要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这一章里，我要先看革命对清遗老的心理冲击；其次，我将把他们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思想的变化作一比较；最后，我将分析他们对革命的反应的动力来源。

郑孝胥(1860~1938)是清末近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活跃人物。他就张之洞幕府，策划各项维新事业，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主持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并且积极参与立宪运动。^①可是他在近代化方面的事业，因为辛亥革命而戛然而止。郑于1911年6月接令补授湖南布政使，8月初到任之后，又于月底接令赴北京参与研讨官制的改革办法。10月11日在北京时听到“湖北兵变”的消息。因为武昌起义，所以他无法回到长沙。^②革命的巨变，不但使他担忧家人的安危，而且也使他考虑自己所应采取的立场。10月

① 郑的传记资料之中，最重要的是《郑孝胥日记》五册，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简略的年谱，有《郑孝胥传》，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上海书店1987年据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年版影印；辛亥以前的郑孝胥，有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49~1354页。



27日,他决定要以清朝的遗老身份终其一生。他认为:

[清廷虽然]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痛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①

郑于1903~1905年负责督办广西边防时,孟森(莼孙,1868~1938)曾是他的幕友。1911年11月14日,孟往见郑,显然是想说动郑,要他改变心意。郑回答说:

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②

孟不放弃,第二天去信,提出“无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明白劝告郑不必效法宋代的忠臣谢皋羽和汪元量。^③郑不为孟的劝说所动,接信后的次日,便详细转载湖南长沙县知县沈瀛为清朝壮烈殉节的经过,并以诗哀之。^④在以后的几个月中,郑又一再作诗哀清之亡,表示他最尊敬仰慕的是屡次不应明太祖之召的元代忠臣王保保。他叹息“举世轻忠义”的风气,立志要以“遗老”终生。^⑤

郑在革命之后,退隐上海租界。1924年春,应废帝溥仪之召,才离开上海北上。

梁济(1859~1918)是我们要研究的另一个清代遗臣。他于1918年11月10日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声言是为清而死。梁考中举人之后,三十九岁才开始任职内阁中书。1906年,他奉调至巡警部任职;清廷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后,继续在民政部任职。他的官位虽然不高,然而对于效忠清朝,则毫无犹疑的心情。清亡之后,他一再表示必死的决心。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退位,梁立即“定此[自杀]主义”^⑥。他在1912年、1913年和1914年时,“祭神则告于神,祭祖则告于祖,身逢清朝鼎革之际,思效历史节义之所为”^⑦。这是梁无法忘怀的问题。他在遗书中有动人的自述:

①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52~1353页。

②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56页。

③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56页。

④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56~1357页。

⑤ 《海藏楼诗集》卷七中的《续海藏楼杂诗》、《危楼》、《十月二十八日夜起》、《十二月二十五日鉴泉示生日诗》、《闻绍述哀二首》都以哀伤清代之亡为主题。

⑥ 梁济:《遗笔汇存》,第105页。

⑦ 梁济:《遗笔汇存》,第102~103页。

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

壬子[1912]、癸丑[1913]年两次在粤西老馆团拜,随同乡先达在关帝、文昌两殿行礼……皆告于神明必将死义,以救末俗。两殿行礼之后,必至先贤位前行礼。先贤牌位中有严亲永宁公之名。壬子后,两次行礼必敬告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又每次到墓前祭奠,必告父母云将行此事。^①

梁济直到1918年年底才实践死义的誓言,这显示了他死前的复杂心情和种种顾虑。可是他终于在几年后以身殉义,说明了他必死的决心。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他自杀的问题。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些清朝遗老纷纷逃往日本”^②。在逃亡日本的遗老之中,罗振玉和王国维无疑是最受人注目和最有研究价值的两个人。

罗(1866~1940)是浙江上虞人,十六岁考中秀才。1904年入新成立的学部任参事厅行走,1909年出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③王(1877~1927)是浙江海宁人,也于十六岁考中秀才。因为罗振玉的推荐,于1907年入学部,在学部的总务司行走,担任学部图书馆编辑。1909年,学部设编定各词馆,严复任总纂,王担任名词馆协修。^④武昌起义后,罗、王和罗的已婚女儿三家人,立即逃亡日本。他们对革命采取了明显的立场。王没有留下出走的记录,所以我们这里依赖罗振玉在自传中的记述:

武昌变起,[汪康年]君至津,招予往言,留屋三间相待。予是年夏即拟出京,而川资莫措。适东邦友人借所藏书画百轴往西京展览,彼邦友人有欲购者,予移书允之,欲以是办归装。乃至秋尚无消息……

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愍公[王国维]亦在[学]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及袁世凯再起,人心颇安,然予知危益迫矣。一日,日本本愿寺教主……遣在京本愿寺僧某君来,言其法主力劝予至海东……遂以十月初[阳历十一月下旬]出都门,往天津待船……予与忠愍及刘氏婿三家上下约二十人……七日乃达神户。^⑤

① 梁济:《遗笔汇存》,第100~101页。

②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③ 有关罗的资料日多,我只列举两种,罗撰有自传《集蓼编》,收于《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2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版;甘儒[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除了上引的袁英光、刘寅生一书外,最早的年谱和以后其他年谱的基础,是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王观堂先生全集》第16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7051~7104页。

⑤ 罗振玉:《集蓼编》,第754~755页。